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 都烟消云散了

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一探

Not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德] 彼得·瓦格纳 (Peter Wagner) 著 李康 译

天津出版社
TIANJIN PRESS



培文书系

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 都烟消云散了

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一探

Not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德] 彼得·瓦格纳 (Peter Wagner)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31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一探 / (德) 彼得·瓦格纳 (Wagner, Peter) 著; 李康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1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ISBN 978-7-301-19591-8

I. ①并… II. ①瓦… ②李… III. ①社会科学—研究 IV. ①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132 号

A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ot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by Peter Wagner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Peter Wagner 2001.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Sage 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 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一探

著作责任者: [德] 彼得·瓦格纳 著 李康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591-8/C·070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320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致 谢

本书是在此前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基础上继续深入阐发,以本书提出的整体观点为宗旨,加以编辑和修订。不过,要对本书第一编中的历史分析作出全面更新,实属无能为力。第八章的论文初稿系与海德龙·弗里泽合撰。完整的文献信息兹列如下,包括起初的标题和发表出处。感谢各出版机构慨允再次利用文稿。

第一章: ‘Science of society lost: On the failure to establish sociology in Europe during the “classical” period’, in *Discourses on society. The shap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edited by Peter Wagner, Björn Wittrock and Richard Whitley, Dordrecht: Kluwer, 1991, pp.219—245.

第二章: ‘The place of the discourse on politics among the social sciences: Political science in turn-of-the-century Europe’, in *Texts, contexts, concepts.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power in language*, edited by Sakari Hänninen and Kari Palonen, Helsinki: Finnish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0, pp.262—281.

第三章: ‘“Adjusting social relations”: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lanning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7, *Modern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dited by Theodore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四章: ‘Social sciences and political projects: Reform coalitions between social scientists and policy-makers in France, Italy, and West Germany’, in *The*

social direction of the public sciences, edited by Stuart S. Blume, Joske Bunders, Loet Leydesdorff and Richard Whitley, Dordrecht: Reidel, 1987, pp.277—306.

第五章: ‘Liberty and discipline: Making sense of postmodernity, or, once again, toward a socio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i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1, no. 4, August 1992, pp.467—492.

第六章: ‘The bird in hand: Rational choice:the default mode of social theorising’, i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esisting colonization*, edited by Margaret Archer and Jonathan Titt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9—35.

第七章: ‘Dispute, uncertainty and institution in recent French debates’,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2, no. 3, 1994, pp.270—289.

第八章: ‘Not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Modernity and contingency’ (with Heidrun Friese), in *Spaces of culture. City/nation/world*, edited by Mike Featherstone and Scott Lash, London: Sage, 1999, pp.101—115.

第九章: “‘An entirely new object of consciousness, of volition, of thought’: The coming into being and (almost) passing away of “society” as an objec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 edited by Lorraine Dast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132—153.

第十章: ‘Crises of modernity: Political sociology in historical contexts’,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ology. The classics and beyond*, edited by Stephen P. Turner,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96, pp.97—115.

第十一章: ‘Modernity-One or many?’, in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edited by Judith Blau, Oxford: Blackwell, 2000.

目 录

致 谢	1
-----	---

序 言 用历史的眼光探讨社会科学	1
------------------	---

第一编 重探社会科学史 7

第一章 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第一次危机：作为哲学性科学 站不住脚，作为经验性科学毫无新意	9
第二章 现代性第一次危机中的政治分析：政治的时代， 而非法律的时代	32
第三章 社会科学与现代性的组织化：调整社会关系	52
第四章 社会科学与改革联盟：社会复兴的迷思性承诺	70
第五章 现代性第二次危机中的社会科学：步调不一	93

第二编 再思社会科学的一些核心概念 115

第六章 选择与决策	117
第七章 行动与制度	135
第八章 文化	154
第九章 社会	170
第十章 政体	194
第十一章 现代性	211
参考文献	226
中外人名索引	245
中外机构、团体与期刊索引	252
中外主题索引	255

用历史的眼光探讨社会科学

20 世纪业已终结,如今回眸望去,它在许多方面都堪称社会科学的世纪。19 世纪末出现诸多思想争论,并往往伴随着建制上的斗争,就是从这些争论中,在哲学和史学的监护下,涌现出了各门社会科学。它们赢得了独立的地位,也让世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它们的诉求:提供有关当代世界的确凿知识和有益定向。就这样,从那些争论和斗争中,创造出了今日所称的“经典社会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于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精神分析等诸多思路,也就是说,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我们依然以其本来形式看待所有这些思路和学科。你很可能想把 20 世纪描绘成社会科学兴起与突破的一段历史。

不过,还有必要提醒两点。一方面,诚然可以把 19 世纪晚期视为建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期,但它们的理论阐述的基本模式,以及所探讨的根本的问题意识,都是脱胎于历史更为长久的一些讨论。由此观之,不如说 18 世纪末突出表现为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时期。这样一来,19、20 世纪之交时的“经典”时期,就成了转型时期,而不是奠基时期。话说回来,一旦引入转型这一观念,新的问题又来了。这种转型导致大致如同我们今日所知社会科学各门学科,能否明确无疑地视之作为一种渐趋成熟的过程?在

新的历史背景下，能否想见进一步的转型？这就引出了第二点看法。

这里说的是在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人们产生了许多怀疑：社会科学的观察、解释和说明世界的方法，是否真能产生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洞见卓识？从诸多不同视角中浮现出“社会范畴的终结”（the end of the social）的幽灵，似乎必然伴随着社会科学的终结。社会世界如此复杂，缺乏明显的理性或秩序，面对这种情形，有些观察者倾向于彻底放弃任何说清社会世界的尝试。另一些观察者则与此相反，把这种所谓社会范畴的终结，视为最终全盘接受一种洞见，即个体及其理性具有核心地位，从而可以基于颇具非社会性的个体主义色彩的理论阐述来理解人类世界。最后，哲学家和史学家纵然长期处在守势，也更新了他们的古老诉求，即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的境况。

本书既不认为社会科学一旦实现突破后必然兴起，也不接受有关它们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起伏兴衰的另一种叙事。无论是某些时期在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还是另一些时期的悲观论调，都不一定有确凿的理据。但如果看到社会科学屡屡遭遇挑战，甚或始终面临质疑，要求重新考虑社会科学的形式和特征，就需要深入思考，各种社会知识生产形式的历史，与理论筑造和概念形塑的模式本身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进行这样的反思，就是本书的目标所在。

总体而言，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治哲学陷入了后革命时代的困境，社会科学就是对这些困境的思想回应。当一系列革命猛一看似乎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无论是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思路的发展，还是与规范性政治哲学传统截然相对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策略的出现，都是要论证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外在形式与实质内容。因此，一部社会科学的历史，就是探讨大多源于政治现代性以降的一些核心问题意识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意识尚未被解决，但它们也不曾被放弃。不过，它们已经经历了历史转型，社会科学的历史即为明证。本书第一编（有选择地）回顾了这一历史。这一回顾也就等于是深入清点，如果想要理解我们当下的境况，社会政治思维的哪些语域可资利用。本书第二编将会使用这番深入清点的发现。

因此，第一编将描绘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历史的某些重要关头所取得

的发展,并结合这些社会的政治制度发展,来评价社会科学的思想发展。头两章(第一章和第二章)聚焦于19、20世纪之交,这段时期往往被视为学科的各门“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期。这两章致力于理解“经典社会学”,理解“古典自由主义危机”期间的政治话语,认为它们应对的是那些后革命时代社会中的第一次重大重构,对于这场转型,我已另行撰文,建议称为“现代性第一次危机”(Wagner, 1994)。接下来两章(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了社会科学如何参与此后的“现代性的组织化”,首先是看它们与社会计划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其次谈它们如何促进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理性主义革命”。本编最后讨论了后现代争论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第五章),认为这场争论属于“现代性第二次危机”的症候。这样的观点使我能将这些争论与现代性第一次危机期间出现的争论相比较,从而更加系统地评估这些思想质疑和重构的时期。

诚然,本编给出了有关社会科学的一种历史和一种社会学。不过,它认为自己并不仅仅是致力于学科史和/或思想史,而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阐述,扣合政治问题意识的背景,来看制度上和思想上的发展趋势。基于这样的阐述,可以得出结论,看看当前社会理论中的概念争论,应当可以遵循什么样的方向。这便是第二编的目标。

<3>

大体说来,本书认为,思想质疑(往往打着后现代性的旗号,至少不久前还常常如此)的现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非常需要进行观念上的重新思考。不过,本书既不接受“后现代”的结论,认为社会世界的可理解性彻底遭到质疑,也不接受相反的结论,认为既然据说不存在任何社会现象,理论阐述就需要从理性主义一个体主义的基础重新开始。相反,本书各章采纳了社会科学核心概念背后的理据,并追问那些理据是如何被视为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可能被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这些概念又在哪些方面依然直指社会理论阐述还需要面对的重要的问题意识。无论是哪种具体情况,都扼要点出了对这类概念的某种新理解。

第二编首先讨论了一些最为宽泛的概念,包括选择、决策、行动和制度。首先,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跨学科扩散的当前趋势,讨论了理性主义的个体主义的限度。同时,结合历史情境的具体背景,阐述这类思维的缘起与应用(第六章)。接下来一章(第七章)转变了问题,探问如何能够重新梳理行动和

制度这两个概念，以求理解行动在相对不确定和可能有争议的条件下的情境性。这种概念分析乃是基于所谓“法国新社会科学”（吕克·博尔坦斯基、劳伦·泰弗诺等人）的晚近研究，摆脱了本体论个体主义或方法论个体主义，又没有陷入集体主义。随后的章节进而讨论了今天基于后现代主义或个体主义理据常常视为站不住脚的那些集体性概念，有文化（第八章）、社会（第九章）和政体（第十章），并探讨了这些概念背后的问题意识为何挥之不去。在此基础上，本书最后收尾于有关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看法（第十一章），它目前被用来使社会科学回到具备概念自觉的对当下的诊断中。

乍看起来，本书所贯彻的将历史与理论相关联的尝试可能显得非常特别。不过，人们过去一直、未来也仍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这种尝试，只是不那么直白罢了。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有两种，在我看来，都需要避免。一方面，有关各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历史数不胜数，其中绝大多数都多少有些掩饰地采纳了一种特别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此前所有的争论都会逐渐导致当下达成的这等概念成就和经验成就，步伐或许时快时慢，但总归坚持不懈。诸如此类阐述的作者们，往往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积极活跃的实践者，而不是观念史学家、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可以理解，作为这类身份，他们会发现，很难想象除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无论过去还是未来，还能获得更高层次的知识。

<4> 另一方面，有些思路坚决主张，思想作品根植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于这些思路，由于缺乏更好的用语，我们姑且称之为批判的社会科学史。这种视角可以说肇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下半叶有不少重要体现，比如乔治·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Lukács, 1954），戈兰·瑟博恩的《科学、阶级与社会》（Therborn, 1976），杰弗里·霍桑的《启蒙与绝望》（Hawthorn, 1976）。这些作者关注的是，自18世纪末开始，到自己写作的时代，社会科学是如何逐步兴起的。他们恰如其分地将这些发展趋势，与资产阶级的兴起，然后是大众社会，最后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不过，他们往往是借助驳斥来进行研究，即便偶尔表示可悲可叹，也还是囿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框架（有关批评参看 Boltanski & Thévenot, 1991, 1999）。其结果，他们无法为自己提供任何手段来区分社会科学中“僵死的与鲜活的”（贝内代托·克罗齐语）。他们聚焦于思想作品的背景根植性，始

终将这种根植性，解释成仅仅是一种约束，而他们自己却可以从远距离的优势位置旁观，进行识别，实现克服。说到底，就是以纯粹线性的、简单明确的方式，对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概念梳理——在这个意义上，与知识演进史中对这种关系的看法毫无二致。

这种批判的社会科学史最近的实例，或许是彼得·马尼卡斯的《社会科学历史与哲学一探》(Manicas, 1987)。不过，诚如书名所示，马尼卡斯想要将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本身纳入问题意识。他的叙述并不是沿循上行或下行的直线展开，而是沿循历史轨迹，在众论家的作品中捕捉到一些重要成分，以重塑社会科学事业的形貌。他认为重塑乃属必要之举，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历史可以称为批判史。由此观之，本书与马尼卡斯的关注话题和处理方式都颇为相似。当然，也有重要的差别。马尼卡斯重点考察的是本体论和认识论议题，而我主要关注的东西，有时被人称为概念形成 (concept formation)。换句话说，就像我们的书名所示，他的作品使用的是社会科学哲学的语言，而我的论证更多的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出发 (但这些区别本身就值得追问，参看 Wagner, 2001)。不仅如此，马尼卡斯依然近似于观念史，而我则期望能更彻底地背景化。这种社会科学史，结合现代性的转型，来谈观念与概念的发展 (参看 Wagner, 1994)。最后，马尼卡斯作品的高潮是，讨论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提出批评；而我的核心关注则是，支撑并贯穿于概念选择与方法论选择的那些问题意识。

与上述所有作品相比，甚至包括马尼卡斯的作品在内，视角上要想有所变化，只有扣合人文社会科学中对语言的崭新关注或更新后的关注这一背景，即有时所称的语言学转向，才有可能。^[1]至于这种语言学转向对社会范畴和政治范畴语言的分析具有什么意涵，已经有诸多研究规划和思路进行过探索，比如与米歇尔·福柯的名字相维系的“当下史” (history of the present) 及随后的相关作品，以莱因哈特·柯施莱克等人为核心的比勒菲尔德史学家所发展的“概念史” (history of concepts)，以 J. G. A. 波科克和昆廷·斯金纳为核心的剑桥史学家所探寻的“语境中的观念” (ideas in

[1] 这里请允许我再次回避更宽泛的哲学议题，只就这一点提及我的《理论上如何阐述现代性》(Wagner, 2001)，事实上，这是本书的姐妹篇。

context) 研究, 以及以海登·怀特为核心的群体所做的“意识史”(history of consciousness)。不过, 那些基于学科的“现代”社会科学, 以及说明并理解社会世界的尝试, 很少成为这些作品的关注核心, 只有遵循福柯视角的某些作品, 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例外。^[2]正是基于这一目标, 本书首先勾绘了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晚期西欧 (以及一定限度上的美国) 的批判的社会科学史, 其次基于历史分析, 重新思考了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核心范畴。

[2] 有关这类作品对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影响, 参看 Wittrock, 1999 的全面讨论。有关现代性的理论阐述的意涵, 参看 Wittrock, 2000。尤其是本书第一编中的分析, 非常受益于与比约恩·维特罗克的长期合作。

第一编

重探社会科学史

第一章

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第一次危机： 作为哲学性科学站不住脚，作为经验性科学毫无新意

对于自己学科的历史，社会学家通常有着清晰的概念。^[1]有关各家各说对于学科发展的具体价值，他们或许意见不一，但往往都会认为，在 19、20 世纪之交，即他们所称的“经典时代”，学科取得了第一轮蓬勃发展。这个时代的边界倒是不难划定。尽管社会学的活动广为渗透，但只有少数几位人物脱颖而出，卓然屹立，往往被奉为该学科的“创建先贤”(founding fathers)，其思想活动的时段颇为重叠。1887 年，埃米尔·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赢得了自己第一个教席；1895 年，马克斯·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就职；1893 年，威尔弗雷多·帕累托在洛桑大学开始执教。涂尔干于 1917 年去世，韦伯于 1920 年去世，帕累托于 1923 年去世。彼时彼刻，他们都已为建构那块思想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有两位采纳了“社会学”这个名称来称呼该领域。至于第三位，即韦伯，更显迟疑一些，但在 1909 年参与创建德国社会学学会 (German Society for Sociology) 之后，也逐渐开始使用这一标签。有鉴于此，社会学家回顾这一时期，视之为自己领域的构成期，或许

[1] 本书中译对书名的正副标题、第一编各章(第一至五章)的正副标题做了倒置,并将原书所附主题索引做了补充、分拆和重编,另编为人名;机构与期刊;主题三个索引。——译注

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以史家的分析眼光来看,这个时代作为社会学职业化的时代,似乎也确立了社会学研究的标准,并就此划出了与其他学术领域和“外行”非职业活动之间的边界(Torstendahl, 1993)。

<8> 不过,这类看法却在某个重要方面具有误导性。诚然,在这段时期里,知识分子致力于在学术机构里确立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但他们的研究规划最终却证明是失败的。社会学的建制化,并不是在其“经典”时代、在欧洲的大学里实现的。不仅如此,究竟应当如何实现这样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并不存在任何共识理解。社会学研究的标准,倒是有所倡议和发展,但却不能在那些自视为社会学家的学人中强行贯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经典”时期的主要思想规划,几乎已被彻底舍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项思想事业,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于“经典”社会学。要理解这场断裂(我在别处有更详细的讨论,参看Wagner, 1990),就必须超出有关制度合法性和科学合法性的问题,看看这些思路是如何通过多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隐而不彰地梳理了政治和社会的概念。

“经典”社会学,除了是一项科学规划,也是一项政治规划。抛开种种变异不论,可以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的思维。它以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预设作为出发点,虽然认识到社会发展已经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但也主张,必须作出修正,以延续这一政治传统(Seidman, 1983)。然而,“现代”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抛弃了自由主义传统,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术语(terms),重新诠释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讨论政治制度的发展,就无从比较20世纪上半叶这两种思路的命运。回顾起来,对于这一时期兴起的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现代”社会学的认知亲和度更高。相反,“经典”社会学的政治合法性却是迅速败落。

接下来,我将首先让读者领略一番,在“经典”时期,社会学的争论是何等激烈,而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社会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又享有怎样的社会地位。我还要指出,到了20世纪头几十年,这种氛围已经衰微。其次,为了让读者理解这些发展趋势,我将尝试从科学、政治和制度等角度出发,界定这门关于社会的科学的规划。再次,这种分析将使我能够基于上述这些角度,结合学术制度的结构,政治制度的结构,以及这两种制度在该时期的转型,为研究规划的失败给个说法。最后,我会简单谈谈,当那些社会学规划“未

能”延续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社会的种种尝试，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其中之一就蕴含了“现代”社会学的内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了主导位置。

第一节 早期社会学的兴衰

从1870年到20世纪早期，众多学人前赴后继，尝试为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奠定基础，绝大多数情况下，它被称为社会学。纲要概论陆续出版，有关期刊相继问世，学术社团也前后成立。而在学术建制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举措，设立社会学的专门教席，引入新型的考试和学位。下文略举数例，以表明欧陆这场社会学运动是何其深广。

在法国，涂尔干的思路只是众多尝试中的一种。在他之前，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已经提出了行动取向的社会科学 (*science sociale*)，并且不乏后人追随其研究规划。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和勒纳·沃姆斯，均与涂尔干同处一时，并与后者竞争合法代表有待打造的这门学科的地位。前两人倡导一种个体主义思路，依据的是视摹仿为社会首要推动力的法则；后者则是从有机论的角度来论证的。在意大利，方兴未艾的社会学领域，甚至更加纷繁多样。早在1888年，当伊奇利奥·万尼尝试说清楚状况，列举有关社会学的不同观念，就举出了不下十种（参看 Sola, 1985, pp.136—137）。而在此之前三年，温琴佐·米切利就已经抱怨，该领域的发展太过迅速，蔚为时尚，乃至全体文人 (*letterati*) 一窝蜂都拥了进来：

可以说只是具备常识的人，甚至是盲目无知的人，都没完没了地针对这门科学大发议论，还著书立说，却根本不曾潜心钻研，因此也不具备起码的准备，而鉴于研究现象呈现出的众多困难，这种准备比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

(Miceli, 1885)

在奥地利，1885年，路德维希·龚普洛维茨发表了他的纲领性作品《社会学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ology*)；1898年，古斯塔夫·拉岑霍夫出版了他